

新时代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理论 渊源、风险挑战及实践方略

刘 近,黄华明

(湖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南长沙 410082)

[摘要]党的文化领导权关乎党和国家前途命运。新时代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立足于马克思主义文化领导权思想,汲取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厚滋养,同时合理借鉴于西方文化领导权理论。新时代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还面临诸多风险与挑战。从外部层面看,西方意识形态凭借“立体攻势”不断渗透,妄图侵蚀我国文化阵地;从内部层面看,文化虚无主义思潮“沉渣泛起”,企图削弱我国文化自信与文化认同。对此,必须着力提升党的文化领导权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力,筑牢思想防线;增强党的文化领导权的制度保障力,夯实制度基础;积极扩大党的文化领导权的国际影响力,提升国际文化话语权。

[关键词]党的文化领导权;理论渊源;风险挑战;实践方略

[作者简介]刘近(1984—),男,河北保定人,湖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法学博士,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黄华明(1999—),男,江西鹰潭人,湖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基金项目]本文系湖南省社会科学成果评审委员会项目“葛兰西意识形态领导权理论研究”(项目编号:XSP20YBC084)。

[DOI] <https://doi.org/10.62662/llyj0102016>

[中图分类号] D25

[本刊网址] www.oacj.net

[投稿邮箱] llyj2025@163.com

党的文化领导权是“党的全面领导地位在文化领域的具体体现”,也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和权威性的重要体现”。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复杂多变的国内外形势,习近平总书记以深沉忧患意识、强烈使命担当、高度文化自觉,从党和国家的战略高度围绕新时代“坚持什么样的文化领导权、怎样坚持文化领导权”等重大课题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特别是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正式提出“中国共产党的文化领导权”的重大命题,为我们续写新时代党的文化领导权的崭新篇章提供了行动指南和根本遵循。因此,深入探赜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的理论渊源、风险挑战及实践方略,是真正弄懂弄通弄透何为、为何、如何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的应有之义。

一、新时代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的理论渊源

新时代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并非无本之木、无根之花、无源之水,而是具有丰富深厚的理论渊源,表现为葆有坚实的理论基石、扎实的文化根基以及有益的理论借鉴。

(一) 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的理论基石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经典作家并未直接提出过“文化领导权”这一概念,但他们关于文化领导权的思想观点隐含于众多经典论述中,构成了坚持

党的文化领导权的理论基石。一是在文化与经济、政治的辩证关系上,马克思恩格斯深刻认识到文化领导权的重要性。他们认为文化、艺术等观念形式对经济、社会发展具有能动的反作用,表现为“物质存在方式虽然是起因,但是这并不排斥思想领域也反过来对物质存在方式起作用”,并且认为“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的资料”。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精神文化、意识形态与政治、经济高度捆绑,文化领导权是获得社会统治权的必备要素。二是列宁在“灌输论”中深刻揭示了文化领导权在无产阶级革命中的价值意蕴。面对当时俄国革命各种错误思潮的滥觞、工人阶级缺乏科学理论指导的困境,他在《怎么办?》中集中阐发“灌输论”核心思想,坚信只有把科学理论从外部灌输到工人阶级头脑中,才能实现无产阶级由自发状态蝶变为自觉状态,使工人运动不陷于经济斗争的窠臼。从这种意义来说,列宁的“灌输论”不仅廓清了文化领导权在无产阶级革命中的核心地位,也彰显了其在意识形态斗争中不可替代的价值意蕴。

(二) 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的文化根基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党创新理论的‘根’。”新时代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须充分把握中华文化的主体性、包容性,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思想精华,从而不断夯实其文化根基。一方面,中华文化具有鲜明的主体性。在数千年中,中华文化主体性与文化领导权建设深度耦合。在中国古代社会,统治阶级凭借文化领导权,使以儒学文化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成为中华文化的核心内容,稳固了中华文化的主体性。近代以降,传统文化受到冲击,中华文化主体性式微。中国共产党诞生后,团结带领广大人民群众在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弘扬革命文化,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过程中逐渐重塑中华文化的主体性。历史和现实充分证明,中华文化主体性离不开文化领导权的有力保障,二者本质上是目的与方法的辩证统一关系。另一方面,中华文化具有鲜明的包容性。“中国人从本民族文化的历史发展中深切地体会到,文化形态是多种多样的、丰富多彩的,不同的文化之间是可以相互沟通、相互交融的。”这种包容性文化映射出中华民族构筑文化领导权的独特理念——并非追求“唯我独尊”的文化霸权,而是致力于构建“包容多样”的文化格局。从尧舜时代产生的融合包容理念,到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大放异彩,再到秦汉时期的政治文化大一统,以及唐宋元明清时期的开放文化胸怀,表明在建设文化领导权过程中,我们始终保持着贯通古今、融通中外的文化气度。

(三)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的理论借鉴

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有着独特地位,为推进新时代党的文化领导权建设提供了有益的理论借鉴。有机知识分子是争夺文化领导权的关键主体。葛兰西洞察到知识分子具有阶级属性,并创造性编码知识分子的“有机性”基因。质言之,有机知识分子代表着新兴阶级的根本利益,假若与人民群众相结合,就会蜕变为“夺取文化领导权的战斗堡垒”。因此,要通过学校、政党等培育自身的有机知识分子,为迎接后续的文化领导权斗争积蓄有生力量。在新时代中国语境下,“哲学社会科学人才队伍”“文艺人才队伍”等不同领域的先进知识分子队伍,通过学术研究、文艺创作、文化传播等多种方式,为增强文化凝聚力和引领力贡献力量,形成推动党的文化领导权建设的强大合力。由此观之,要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取得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必须坚持以“分子式渗透”进攻方式展开旷日持久的阵地战,攻克资产阶级在市民社会领域中构筑的坚固思想防线,夺取涵盖工会、学校在内的所有文化领导权阵地,最终取得整个市民社会领域的文化领导权。

二、新时代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的风险挑战

新时代党的宣传思想文化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形势发生全局性、根本性转变,印证着党的文化领导权建设之路不仅走得对、

走得通,而且走得稳、走得好。与此同时,全球多元文化相互激荡、世界各种思潮此起彼伏、各国舆论交锋时有发生,种种因素交相叠加,共同塑造着党的文化领导权建设面临的风险挑战。

(一)外部挑战:西方意识形态渗透的“立体攻势”

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采取系统化的意识形态渗透策略,在渗透范围、内容、途径上多维发力,构建起立体化的渗透攻势,对党的文化领导权构成严峻挑战。其一,渗透范围上横向覆盖。西方意识形态渗透的策略已从单一主体转向多元主体,旨在全面占领党的文化领导权的核心辐射区域。从现实来看,西方反华势力把渗透“矛头”指向处于“拔节孕穗期”的青少年,利用国内某些大V、公知等群体在公共领域的影响力,散布极端言论,恶意中伤党和政府形象,以此消解青少年对党和国家的认同感。随后,西方敌对势力会基于意识形态渗透“病毒式”传播特性,实现渗透范围量级呈指数型增长,逐步将工人、商人等其他社会阶层纳入渗透网络,最终试图全面瓦解党的文化领导权。其二,渗透内容上纵向深入。在纵向时空维度下,西方意识形态渗透在输出内容上呈现出显著趋势,即内容构成正从表层政治性攻讦向深层生活化、叙事日常化转变。为了夺取中国的文化领导权,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从新中国诞生以来始终坚持把明面上的“政治对抗”作为中西较量的主旋律,不断诘难日益崛起的中国。近年来,西方意识形态渗透的重心发生偏移,“更多地西方思想价值观念融入经济、文化以及社会生活等多样化的内容中”,向中国人民输送附带意识形态属性的日常文化产品。西方意识形态渗透的内容从“政治化”向“亲民化”“生活化”的深度转型,无疑会增强其无孔不入的渗透力,不断侵蚀党的文化领导权的群众基础。其三,渗透途径上侧向隐匿。西方意识形态渗透呈现出传播方式的侧向迂回化、隐匿化态势,渗透途径发生从传统低效化向现代信息化的转变,意图悄无声息地销蚀党的文化领导权。网络空间所具有的虚拟性和隐蔽性,为西方意识形态渗透提供了天然的庇护所。西方敌对势力通常会利用网络空间的虚拟性、隐蔽性精心策划并散布一系列证伪马克思主义、攻击社会主义制度、挑起对立情绪的言论,在不知不觉中误导民众,激化社会矛盾,进而阻滞党的文化领导权建设。

(二)内部挑战:文化虚无主义思潮的“沉渣泛起”

长期以来,文化虚无主义思潮一直是干扰党的文化领导权建设的重要因素。“新中国成立后,文化虚无主义思潮曾一度销声匿迹。进入改革开放后……文化虚无主义思潮在我国再次泛起。”这一思潮的复燃,具象为三个方面。其一,矮化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企图侵蚀党的文化领导权的传统根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中国共产党文化领导权的深厚文化沃土。然而,文化虚无主义思潮将其视为攻击目标,以破坏党的文化领导权的传统文化根脉。文化虚无主义者罔顾历史事实,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精华部分歪曲为封建糟粕,声称其缺乏先进性基因,无法顺应世界文化发展潮流。这种恶意篡改,目的在于遮蔽中国共产党文化领导权所依托的深厚历史文化底蕴,使民众对自身文化根源产生怀疑,进而动摇党的文化领导基础。其二,丑化革命文化,企图破坏党的文化领导权的红色底蕴。革命文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形成的宝贵精神财富,是党的文化领导权的政治本色。鉴于此,文化虚无主义者“将近代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的伟大抗争丑化为偏离近代文明轨道的逆流”,宣称中国革命与国家现代化进程相抵牾,炮制“革命不如改革,改革不如改良”的荒谬观点。这种言论是西方敌对势力企图通过否定中国革命正当性,假借“向世界传播文明”之名行颠覆党的文化领导权之实。其三,污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企图解构党的文化领导权的社会主义文化底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我们党领导人民在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创造的文化成果,但文化虚无主义者企图对其进行解构。他们竭力污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制度规定性,叫嚣“社会主义制度只是低配版的资本主义制度”,妄图颠覆党的文化领导权赖以维系的制度框架,并试图分解党的文化领导权所必需的社会主义文化因子,达到破坏党的文化领导权的目的。

三、新时代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的实践方略

为了有效应对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所面临的风险挑战,须在提升党的文化领导权的意识形态主导力、增强党的文化领导权的制度保障力以及扩大党的文化领导权的国际影响力上下功夫。

(一)提升党的文化领导权的意识形态主导力

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文化领导权建设的核心内容。要通过争夺意识形态斗争主动权以及把牢意识形态领域管理权,确保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落实、落细、落深,从而提升党的文化领导权的意识形态主导力。一方面,要争夺意识形态斗争主动权。行动上的自觉源于理论上的清醒。要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论述武装全体党员干部,唤醒他们的斗争意识、增强他们的斗争本领。此外,要注重培养和锻炼党员干部见微知著的能力,使其能够从细微之处,察觉潜在的意识形态安全风险,提前制定应对策略,将风险扼杀在萌芽状态,形成高灵敏度的意识形态“免疫屏障”。另

一方面,要把牢意识形态领域管理权。在中西意识形态斗争中,要贯彻主管主办和属地管理原则。按照一定的标准,将意识形态领域分割为若干阵地管辖区,科学安排每一块阵地管辖区的主管人,并且定期考核这些阵地管辖区的工作成效,切实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同时,要注重利用信息技术赋能意识形态阵地的管理,努力把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可能出现文化冲击、社会舆情等状况转化为可视化的指标参数,厘清意识形态领域各类问题性质及演变趋向,为寻求破解之法提供科学依据。

(二)增强党的文化领导权的制度保障力

建立健全科学完备、有效管用的制度体系是推进党的文化领导权建设的重要保障。一方面,要建立监督筛查机制,筑牢文化安全的“过滤网”。现实和网络双重空间充斥着良莠不齐的文化信息和文化产品,亟须建立“过滤网”型的监督筛查机制,去除隐藏其中的不良文化信息和文化产品,为维护文化安全构筑起第一道防线。值得注意的是,社会公众人物的一言一行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响,所以要组织相关部门积极开展动态跟踪,严格排查此类非官方社会群体输出的文化信息、文化产品是否涉及西方不良的价值观念。一旦存在文化违法行为,要及时消除产生的不良文化影响,重塑正确的价值取向。另一方面,要健全网络媒体法治体系,构筑网络文化安全的“防火墙”。当前,网络媒体日益成为信息内容生产传播的重要渠道和载体,还存在履职尽责不到位、管理操作不规范等威胁文化安全的隐患问题,“防火墙”型的网络媒体法治体系亟待健全。从宏观层面来看,要增强各类网络媒体法治体系的适配性。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等高级别行政法规相继出台,要结合地方实际以及各类网络媒体的共性问题,制定出具有可行性、针对性的媒体规范管理条例。从微观层面而言,要规制网络媒体的运行逻辑。要在流量巨大的网络媒体上入驻更多官方号,同时将媒体向网络用户推送的文化信息纳入法治化管理轨道,以巩固网络领域党的文化领导权,维护我国文化安全。

(三)扩大党的文化领导权的国际影响力

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提升国际文化话语权,已成为扩大党的文化领导权国际影响力的必然选择。一方面,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明晰国际传播内容。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是推进国际传播格局重构的前提和基础,其核心目的在于解决“讲什么”的问题,实现中国在国际舆论场中“有理说得通”。西方凭借现代化发展的先发优势,构建起具有主导性的“元话语”和“元叙事”体系,使中国在国际文化交流中常陷入“自证”困

境,迫切需要明确中国文化话语的核心内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蕴含着丰富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价值理念等,要尽可能“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标识提炼出来、展示出来”,从而打破西方文化的话语权“壁垒”。另一方面,创新融通中外的表达方式是推进国际传播格局重构的关键之举,重点解决“怎么讲”的问题,实现“中国话语传得开”。过去,我国文化对外宣传存在“自说自话”的现象,传播效果不佳,未能有效抵达国际受众。基于此,要“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更加充分、更加鲜明地展现中国故事及其背后的思想力量和精神力量”,在把“我们想讲的”变成“世界想听的”,把“世界想听的”融进“我们想讲的”的过程中实现党的文化领导权影响力的泛在化、常在化。

参考文献:

- [1] 蔡文成,刘富东.新时代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的科学内涵、价值意蕴及实践路径[J].思想教育研究,2024(11):63-67.
- [2] 张波,石美亲.新时代党的文化领导权的价值意蕴与实践进路[J].理论探讨,2024(3):20-29.
- [3] 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J].求是,2023(17):4-11.
- [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86.
- [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78.
- [6] 习近平.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为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而不懈奋斗[N].人民日报,2022-10-29(1).
- [7] 费孝通.中华文化在新世纪面临的挑战[M].北京:群言出版社,2007:245.
- [8] 蒋先欢.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及其对构建中国话语体系的启示[J].理论月刊,2018(11):89-96.
- [9] (英)斯蒂夫·琼斯.导读葛兰西[M].相明,译.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4:39.
- [10] 孙炳炎.清醒认识西方意识形态渗透的“四化”新态势[J].理论探索,2020(6):70-76.
- [11] 杨军,马雯婕.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导克服文化虚无主义[J].湖南社会科学,2024(3):10-15.
- [12] 吴海燕.新时代文化虚无主义的三重理论批判[J].思想教育研究,2020(11):79-84.
- [13] 人民日报评论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38.
- [14] 习近平.加强和改进国际传播工作 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N].人民日报,2021-6-2(1).

The Party's Cultural Leadership in the New Era: Theoretical Origins, Risks and Challenges, and Practical Strategies

LIU Jin, HUANG Hua-ming

(Marxism School, Hunan University, Changsha Hunan 410082, China)

Abstract: The Party's cultural leadership is crucial to the future and destiny of the Party and the country. The Party's cultural leadership in the new era is based on Marxist cultural leadership thought, draws nourishment from the rich heritage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also rationally draws on Western cultural leadership theories. However, the Party's cultural leadership in the new era still faces many risks and challenges: Western ideologies are constantly penetrating through a "three-dimensional offensive", attempting to erode China's cultural territory; the trend of cultural nihilism is resurfacing, aiming to undermine China's cultural confidence and cultural identity;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landscape shows a "strong West, weak China" situation, and the competition for international cultural discourse power is severe. In response, it is necessary to enhance the Party's cultural leadership's dominance in the ideological field, build a solid ideological defense; strengthen the institutional guarantee of the Party's cultural leadership, and consolidate the institutional foundation; actively expand the international influence of the Party's cultural leadership, and enhance international cultural discourse power.

Key words: Party's cultural leadership; theoretical origins; risks and challenges; practical strategies